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 (16) 下



世界五千年

爱因斯坦与“相对论”

“相对论”被称之为受到教育的心智所能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相对论”是科学巨匠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现代物理学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1905年，爱因斯坦在短短6个月时间里，在物理学的三个不同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第一个是发展普朗克的量子概念，提出光束的能量在传播、吸收和产生过程中都具有粒子性，即量子性，也就是光电效应理论。第二个是在分子运动方面用统计学和力学相结合的方法为布朗运动做出了理论上的说明。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狭义相对论。

物理学家们特别称道“相对论”，是出为它不像其他的理论那样随着时光的流失而黯然失色，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光彩照人。“相对论”的提出，它将时间、空间、能源和物质这些传统的概念击得粉碎。它的数学表达式已经揭开了自然界一些最本质的秘密。它其中的一个方程式已成为原子时代的中枢。

那么“相对论”理论讲了些什么呢？是如何产生？它的作用又是什么？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以电力能源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同第一次技术革命相比较，电气化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要特征。而第二次技术革命的理论准备则是电磁学的产生和发展。19世纪前半期，电和磁在理论上的重大成就，就在于为后来的电磁现象的实际应用开辟了道路。但是在研究电磁现象领域时遇到了“以太疑难”。正是在解决“以太之谜”的各种探索中，为“相对论”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法拉第、麦克斯韦建立了电磁场理论。但是，当时麦克斯韦并没有认识到，电磁场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物质实体，而把“以太”看成是电磁场的物质基础，同时又认为电磁现象则是“以太”的表现形式。而赋予“以太”以多种不同的性质（惯性、弹性、透明性……等），这些性质往往相互矛盾，因而形成了“以太之谜”。

早在1725~1726年，布雷德利通过长期天文观察发现，恒星的表观位置在一年内会发生变化，这称为光行差现象。1818年，菲涅尔按照“以太”是绝对静止的假设，对光行差现象进行了解释。1845年，斯托克斯不同意“以太”完全静止说，而认为“以太”会受外力作用而运动。为了证实这个问题，科学家们从多方面对此进行研究。如果“以太”是绝对静止的，就应该存在“以太风”，即可检测到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速度。这种“以太”的绝对静止和弥漫于整个空间的性质，正好对应着牛顿的“绝对空间”。由于这个特点，更增强了“以太风”的兴趣。所以，从19世纪中后期，直到20世纪初，“以太风”成了物理学发展中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

1904年，彭加勒在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和科学大会的演说中，根据大量实验事实，正式提出相对性原理这个名称。他说：“根据这个原理，无论对于固定的观察者或者是匀速运动的观察者，物理定律应该是相同的，因此，没有任何实验方法可用来识别我们自身是否处于匀速运动中。”

由于彭加勒也相信“以太”的存在，也没有对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产生怀疑。因此，应该说其思想离“相对论”思想还有一定的差距。总之，爱因斯坦是在电磁学理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还存在内部不和谐的情况下来开展自己工作的。当时的物理学，已经从实验和理论两个方面为“相对论”的诞生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但还没有达到揭示“相对论”思想本质的程度。

寻找“以太风”的失败，成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负结果。尽管前面的人已做了很大努力，但没有突破。问题已很明显，只有抛弃机械的“以太”去创立看来似乎与常识相矛盾的学说才是克服紧张形势，找到正确出路的关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说过：“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爱因斯坦正是以这种精神，在新的实验事实面前革新了旧有观念，他比别人站得更高，通过艰苦的思索和劳动，于1905年创立了“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他1905年发表的《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著名论文，揭示了“狭义相对论”的原理。他指出：光的速度是不变的，它与观察者和光源的运动速度无关；物体在运动时，不但它的大小发生变化，而且时间过程本身也发生变化。他的理论说明了空间、时间、物质和物质运动并不是彼此孤立无关的，而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空间和时间统一成一个四维时空。空间和时间的性质随着物质的运动而变化。相对论破除了作为牛顿理论体系中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的先验主义的概念，深刻地揭露了物质世界的统一性。

“狭义相对论”是建立在爱因斯坦的两个假说上的。第一个是著名的狭义相对性原理。从本质上说，狭义相对性原理是力学中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直接推广。就它的广泛意义而言，人们不能通过任何实验来确定惯性系自身的运动，因而就没有任何绝对的运动存在。地球由于绕太阳的运动，在一年四季的不同时间里可作为不同的惯性系，但任何时刻进行的电磁学实验都显示了同一电磁规律，那些企图证明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实验的失败，是相对性原理的胜利，第二个是光速不变的原理。爱因斯坦提出：在真空中，光总是以一个不变的速度传播，这个速度的大小与光源的运动无关；光速与光波频率无关；光速与观察者运动状态无关；光速向各个方向传播的速度相同。这是一个从科学实验和电磁理论中提升出来的假设，其中的假设成份主要是光速的各项同性。因此，“相对论”与牛顿物理学是一致的。然而，在物体高速运动时，牛顿物理学就不能判断和描述宇宙了。因此，宣称“相对论”取代了牛顿的物理学是不准确的。“相对论”是站在巨人牛顿的肩上看世界的。

“相对论”使人们最终明白：主张任何形式的运动为绝对运动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没有绝对静止界标存在下，所有的运动都是相对的。许多年来，地球一直被错误地想当然为静止的，并且作为绝对界标存在使用。直至1543年，哥白尼的“日心说”改变了所有这些观念。如今我们知道：地球以20英里/秒的速度绕轴自转，它同时又以1000英里/秒的速度绕太阳运行。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又以13英里/秒的速度绕恒星系运转，而后者又在银河系中以200英里/秒的速度运动。我们的银河系在整个星系中以100英里/秒的速度运动。

我们知道，夜晚的天空是几千年甚至几百万年前的景象，因为来自遥远恒星的光需要无限的时间才能抵达地球！对我们而言，“现在”的夜晚天空的景象已是这些恒星的历史了。我们眼见到的一些恒星也许现在已不存在了，而其光还未到达地球上的一些年轻恒星我们还看不见，但却已经存在了。因此，从本质上讲，过去、现在和将来与时间一样是某种程度上的空间分离。

“绝对现在”观念的终结也带来了“绝对同时性”观念的末日。对一观察者来说似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对另一观察者来说也许是相隔几分钟、几天、甚至几年发生的事。

“相对论”中最有趣的现象是时钟变慢。这被称为时间扩展效应。这个现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请看下面的例子：在一快速运动的火箭里的一只闪光信号朝着火箭运动的垂直方向发射出一束光脉冲，对面机壁上的反光镜又将此光脉冲反射回其光源处，两位观察者记下其持续时间。一位观察者是火箭内的宇航员，另一位是位于地球之上、观看从他面前一晃而过的人。宇航员所看到的是光脉冲翻来复去地在火箭舱内上下传播。对他来说，该事件的持续时间（按照公式距离 = 速度 × 时间）等于距离（火箭的宽度的二倍）除以光速（每秒 3×10^8 英里）。

但是，地球上的观察者看到的却是另一景象。光脉冲不仅上下移动，而且由于火箭的运动，光脉冲还在水平方向上左右传播。对此观察者来说，光程看起来就像这两种运动共同作用得到的倒置 V 型。这距离要比宇航员测量的要长一些。因为光速对所有的观察者都是一样的。因此，地球上的观察者测量到该事件的持续时间要比宇航员测得的要长些。当然，火箭运行得愈快，倒置的 V 型就会愈长，对静止的观察者发生该事件持续的时间就会愈长。

如果光脉冲的上下移动对特别的光波钟是一个时间单位的话，那么，对宇航员似乎是正常的时间单位，而对静止的观察者来说似乎延长了，好像该钟走慢了一样。时间扩展效应与钟的结构毫不相干。所有的运动时钟，无论是机械的还是生物的，不仅相对于静止的观察者来说其速度变慢了，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与静止的观察者相比较，以接近光的速度运动，这也许是延年益寿的一种途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狭义相对论”的发展有两个主要步骤，那就是使空间、时间“度规”适合于麦克斯韦电动力学，使物理学的其余部分适合于那个改造过的空间、时间“度规”。其中第一个步骤产生了同时性的相对性，运动对尺子和时钟的影响，运动学的修正，特别是关于速度相加的新定理。第二个步骤使我们对大速度的牛顿定律作了修正，同时使我们对惯性质量的本性得到了有基本重要意义的知识。但“相对论”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由此而兴起的“相对论”的那个问题的范围。它扫除了场论的许多困难和矛盾，它建立了更普遍的力学定律；它用一个守恒定律来代替两个守恒定律；它改变了我们旧的绝对时间的概念。它的有效性不仅限于物理学的范围之内，它已成为网罗一切自然现象的普通框架。”

当然，“狭义相对论”也有它的适用范围，只有在弱引力场的情况下，引力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时，“狭义相对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在引力场比较强的情况下，引力的影响不容忽略，时空的特性就应由“广义相对论”来描述。

1905 年出版的《狭义相对论》并没有立刻使爱因斯坦名扬四海，他在瑞士的一个专利局里当小职员一呆就是 4 年，用普普通通的薪水供养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而后爱因斯坦才慢慢地得到各地有名声的物理学家的尊敬和承认。从 1905 年至 1915 年，他用了 10 年的时间来研究“广义相对论”。

那几年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福祸交加的几年。婚姻失败，他却被授予当时欧洲最有声誉的科研中心之一的凯撒·威廉学院的董事之职。他发表声明谴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公开宣布他的和平主义主张。但是，他最主要

的目标是研究一种新的宇宙理论。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又刻苦自学了黎曼几何和张量计算的新型数学工具。

在继续从事新理论研究期间，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爱因斯坦写道：“在我一生中，以前我从来没有工作得这么艰苦……与这个问题相比，“狭义相对论”只不过是儿戏而已。”

在“狭义相对论”中，“狭义”仅仅涉及到运动的有限情况，即匀速运动。“狭义相对论”没有考虑到加速运动或在不同的引力场中的运动。对爱因斯坦来讲，这不完善，他认为，一定有一个更普遍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和情况。他思维的始点是人造引力现象。当升降机突然向上加速时，我们会瞬间感觉较高一些。从本质上讲，加速系统可以人工制造引力。加速度和引力之间的联系以等效原理来描述。此原理是“广义相对论”大厦的基石。

等效原理认为，在加速系统中观察到的现象和做的实验与引力场的很相似。换而言之，加速度和引力的效果是相同的。当漂浮在宇宙飞船的需引力场中的宇宙飞行员突然“跃到地板上，他不能说出是他的宇宙飞船突然加速还是飞船着陆而造成的。爱因斯坦断定，等效原理不仅对机械现象，而且对所有自然现象——光学的，电子的，甚至生物的都合适。”

让我们来看一看等效原理在一个火箭内的应用例子。火箭最初是在地球上，假定我们沿水平方向朝另一壁掷一个球，地球的引力将使弯曲球的飞行轨迹像球滚出桌子一样。按照等效原理，如果火箭在外层空间以等于地球的引力造成的加速度（ 9.8 m/s^2 ）运动，球就会具有相同的飞行轨迹。如果现在我们用一束光来代替这个球，那么，我们一是会检测到一个微小又可测得的弯曲——因为按照 $E = mc^2$ ，光具有能量，也就同时具有了与质量有关的特性。等效原理令人吃惊的结论是，如果光线在一加速火箭内弯曲的话，它一定也会在引力场中弯曲。

1913年爱因斯坦同大学时代的同学、数学家格罗斯曼合作写出论文《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纲要》，同时以张量分析和曲面几何为工具建立了引力场的度规理论，利用微分几何这个数学工具他们发现，必须用十个函数而不是由一个标量函数去描述引力场。这篇文章基本勾划出了“广义相对论”的主要面貌。1915年爱因斯坦找到了引力场方程，同年10月，希尔伯特从变分原理的角度也得出了引力场方程。根据“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解释了水星近日点的运动，计算出了光线掠过太阳时的正确偏转值。1916年，他的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就是这项工作的总结，他标志着“广义相对论”的最终建立。

爱因斯坦理解的引力对时间和光波的影响与其说是自然界孤立的畸变，倒不如说是包含着“相对论”所有现象的重要设计的表象。从1911年到1916年，爱因斯坦一直在寻找着能够以一种简单而又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引力及其对光波和时间的影晌模型。他最终创立了一个多维连续时空模式。在此模式下，空间被引力“弯曲”了。爱因斯坦描述了一个引力不再是一种力而是在多维连续时空中的几何畸变的宇宙。

在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里，引力、空间和时间是相互联系的，从而形成了四维连续时空。这对于习惯于三维世界的人类大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任何试图使四维空间形象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首先要体会一下作为一维变量的时间的角色。在地图上，我们只需两个坐标定一点。在三维图中，我们还要第三维变量——高度。因为现在拿时间作第四维变量，即使我们是静

止的，在连续时空中，我们是没有相似坐标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坐标和我们的位置就会发生改变。

“相对论”现存的秘密之一便是引力通过时空与物质传送的机制。爱因斯坦认为引力一定具有一些与光波相同的光性。例如，有人认为，引力传播的速度与光波的速度一致。因为光显示出波动性和粒子性，所以，预计引力也具有相同的性质。

爱因斯坦创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在物理学史上的确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物理学，已渗入到艺术、哲学甚至政治这些领域之中。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把“广义相对论”称之为人类曾经作出的最伟大的科学发现。

“相对论”对现代物理学起的巨大推动作用现在越来越明显了。“广义相对论”中关于物理学问题的数学处理方法，物理学方程的协变性要求日场的速度规模论等，在当前的物理学理论研究中已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或思想接受下来。可以说，“相对论”已与量子力学理论一起成为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矗立在伟大的科学殿堂之内。

让我们在看到爱因斯坦的成绩时，再来回顾他光辉的一生。

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时代，爱因斯坦的学业并不出色，在那种单调制度下，他被搞得精神很紧张，甚至未能从这所学校毕业。但是，少年时代他就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中学时对数学特别感兴趣。12岁时便证出了华达哥拉定理。后来，他又自修了物理学。

1894年，爱因斯坦的父亲生意破产，全家移居意大利的米兰。在那里，年轻的爱因斯坦开始对科学发生了兴趣。16岁时，他写了第一篇《关于磁场中的以太研究现状》的论文。

1896年1月，他进入苏黎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非凡才能初露锋芒，在大学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埋头于物理实验，刻苦自学了理论物理，立志要成为一名物理学家，献身于理论研究。他读了很多书籍，马赫的实证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乌托邦的经济学说等。

他广泛阅读了各个物理学大师的著作，为日后的新理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05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根据大量的科学实验事实，否定了多少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提出了“相对论”的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创建了现代物理学的理论支柱之一——“狭义相对论”。

191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广义相对论”。除了“相对论”外，爱因斯坦还在统计学、热力学、量子力学等方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还是最早从理论上预言激光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列宁称他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大革新家。

他不是神童，少年时代并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才能，但是，他喜欢思考问题，具有“离经叛道”的性格。他有自学的本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他通过自学在狭义相对论、光电效应、布朗运动三个重要领域里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在科学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取得辉煌成果后，他并没有陶醉于胜利中。爱因斯坦追求真理，永不

停步。这种献身于科学的精神，堪称是后人的楷模。

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此他成了名扬世界，誉满全球的人物。但他并不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就，总是胸怀若谷地不断探索未知的真理，一往无前地向更加坚固的科学堡垒进攻。

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杰出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精神高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正直的人，也是一个具有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世界公民。在整个人类自然科学史中，他的成就与影响，只有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可相媲美。由于他创立了“狭义相对论”，从科学界默默无闻的一个小人物，突然间成了牛顿之后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尔兰哲人肖伯纳曾经说过，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创造了一个新的宇宙。”

但是，他从不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且热情地关心整个社会，关心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作出那些实际上短暂而又有风险的一生实现生命的意义。”他认为，要使人类社会高尚起来，榜样的作用是重要的，而他自己就有责任作一个榜样。因此，凡是他所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都要公开表态；凡是他所了解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迫害，他都要公开揭露和谴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公开谴责德国法西斯的罪行……因此，他成了法西斯分子追捕的对象，他的家被抄，财产被没收，著作被销毁。他逃离德国后，流浪世界，成了世界公民，先到法国，又到比利时，再到英国，最后在美国定居。

1955年4月18日，这位伟大的世界公民、著名的当代天才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世长辞了，他直到逝世前还在向全世界呼吁，为了使核战争永远不发生，应该缔结某种协定。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风急云骤的时刻，内忧外患煎熬着中国人民，促使着人们奋起抗争。

1894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败得一塌糊涂，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时，各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紧了对华侵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民族的危亡，激起了中国人民开展反侵略、反瓜分、反洋教的斗争，到1898年终于汇成了汹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反帝烈火遍及北方，波及全国。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在清政府的配合下，扼杀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1901年清政府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勒索了中国巨额赔款，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国势岌岌可危，人民生活日益困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与西方列强疯狂掠夺相对应，腐败专制的满清政府对外奴颜卑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对内则“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捕杀“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帝，压制变法，鱼肉百姓。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苟延残喘的慈禧太后，为掩国民的耳目，居然也叫咕起“新政”，装模作样地开工厂，办新学，妄图既讨好西方列强，也应付国内危机，使有识之士进一步认清了满清专制的真实面目。

外敌的侵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卖国腐朽的本质，使人民大众迅速觉悟起来，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中日益壮大的知识分子群众救国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政治运动中去，形成了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爱国运动，为民主革命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他们在各地组织学习集会抗议，掀起“拒俄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收回铁路，掏洋货。这样就使广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团体的兴起和发展。

正当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蓬勃兴起之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们摒弃了改良求道、变法维新的思想，纷纷成立革命团体，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批驳康有为等人的保皇思想，从而使先进思想开始传播开来。

1892年，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获得了毕业文凭和行医执照。他以良好的医德、高超的医术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先后辗转于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目睹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对人民的困苦生活深表同情。他认为，人民受苦的祸根在于愚昧，因此他决定开展“医国事业”，“借医术为入世之媒”，通过行医与社会各阶层广泛接触，煞费苦心“物色有志青年，结为团体，以任国事”。1893年冬，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陈少白等人聚会讨论救国方法，他们当中多数人“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治标方法，而孙中山主张治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大家同意了孙中山的主张。1894年孙中山来到了广东华侨集中的檀香山，经过一个多月的奔走游说，由孙中山倡议，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与何宽、李昌、刘祥等20多人，在一个华侨家中召开了兴中会成立会议。大家围坐在长桌旁，庄严肃穆。坐在主席位置上的孙中山，手握《兴中会章程》，把对祖国和同胞的深切感情，对中外反动势力的愤怒控诉有机地结合起来，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朗朗有声地念着，使得那些远离故乡的游

子回肠荡气，感慨万千。大家一致同意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各人用左手拿着一本打开的《圣经》，右手高举向上，朗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这样，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就建立起来了。它以推翻清朝专制，建立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此后，孙中山在海外各地华侨和留学生中作了大量的宣传和联络工作。他以日本为中心，不辞劳苦，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往来于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世界各地，考察各国的风俗人情，研究西方的民主政治，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特别是1905年他在比利时的活动，他和爱国学生贺之才、朱和中等人畅谈建国要义，大家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讨论连续进行了3天3夜，这使孙中山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有着决定的意义。自1903年后，孙中山即把工作重点放在新兴的知识阶层中，从而大大加强了国内各种革命力量和革命团体的联系工作，这就为促进新的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兴中会成立后，其他革命团体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04年4月，黄兴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同年7月，湖北革命志士吕大森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1905年，刘静庵、曹亚伯等在武昌成立日知会。1904年11月，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在江浙知识分子和会党中进行活动。此外，各地还有各种小团体，如1904年4月在南昌成立的易知社，1905年在鞠湖由陈独秀成立的岳王会等组织。这些革命团体或秘密地或公开地活动，推动各地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成为民主革命力量的摇篮，为同盟会的建立提供了组织条件。

在革命团体纷纷建立的同时，中国大批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出国，试图汲取外国的先进东西。1900年留日学生不到100人，1904年达3000多人，赴欧美留洋的也不下几千人。“东西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这慷慨激昂的诗句，真实地表达了当时大部分留学生的共同心愿和心情。这为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的创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革命团体的大量涌现、大批爱国志士的出国留学，先进思想也广为传播，逐渐深入人心。从1901年起，进步知识分子在日本和国内出版了大批书报刊物，宣传反清及西方民主政治思想，批驳康有为等人的保皇论调。其中比较有名的报刊，在东京有《国民报》、《游学译编》、《浙江潮》；在国内有《苏报》、《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等。特别是从1903年起，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活跃起来，形成了一个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高潮。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以犀利的文笔，批判康有为的“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谬论，指出“革命非天雄六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1903年，年仅18岁的邹容，以饱满的热情、通俗易懂的文字，写下了长达2万余字的《革命军》，热情讴歌革命，痛斥专制弊端，号召人们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的政体”，为开创“中华共和国”而斗争，宣扬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思想。《革命军》出版后，反复再版，发行量占清末书刊第一位，影响极其深远，看过此书的人，莫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这一年，陈天华用白话文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

写成了《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小册子，宣传反帝和反清思想，号召人们起来“改条约，复税权，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在全国各地特别是两湖学界和新军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样，在同保皇派的论战中，先进思想广为传播，日益深入人心，为统一新的革命团体提供了思想条件。

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先进思想的深入传播，若干分散革命小团体的出现，自然把一个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那就是把分散的革命力量聚集起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革命组织，使大家的目标和行动协调一致，从而更有力地把革命向前推进。当时，中国大批青年和学生纷纷留洋，日本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地方，到1905年竟增加到8000多人，不仅人数增多了，而且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趋向革命的人日渐增多。但是这些力量正处于散漫的状态中，缺乏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从而把这些力量汇聚起来。华兴会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此时也在日本，但华兴会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并且带有很浓的地域色彩，未能成为留日团体中的力量核心。因此，成立一个新的能拥有更广泛力量的组织已成为许多人议论的中心。联合已成为迫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由于首倡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领袖，成为团结各方面力量的中心人物。

1905年夏，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途经越南、新加坡等地，7月19日到达日本横滨。久闻孙先生大名的广大留日学生听说他东归的消息后，莫不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欢迎。几天后，孙中山到达东京。当时留日学生汇集东京，革命热情高涨，黄兴、宋教仁两人更是雄心勃勃，最露头角。孙中山首先拜访了他的热心于中国革命事业的日本老朋友宫崎滔天。寒暄过后，孙中山就迫不及待地问：“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真是件大好事。可当中有没有非同一般的学生，有没有可以加入我党的志士？”宫崎一边泡茶，一边告诉他说：“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一个伟人，估计将来可以作你的助手。”孙中山听了非常高兴，恨不得马上去找。宫崎止住他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孙中山急不可待地说：“这样的事，无什么后辈前辈之分，是我打听到消息，还是我去拜访他。”说着就拉住宫崎一同去拜访黄兴。到了黄兴住处，宫崎推开窗子一看，一大堆留学生围坐在一起，正在兴趣盎然地谈论什么。宫崎把黄兴叫出来后，黄兴一眼就认出了曾在照片上见过的领导过广州、惠州起义的兴中会领袖孙中山先生。说话间宋教仁、张继、宋教仁等人也赶到跟前，见面后，大家异常高兴。接着6个人一起到了一家名叫风乐园的中国餐馆。他们边吃边聊，谈了近两个小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嗣后，大家共同举杯祝贺。

7月下旬，汪精卫、朱执信等几个留学生慕名前去拜

访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和他们畅谈，要求大家组织起来，建立共和国，改变中国贫穷孱弱的面貌，使中国跨入先进国家之林。孙中山的话娓娓动听，鞭辟入里，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大家当场表示拥护孙中山组织统一革命团体的主张。7月28日，孙中山和宫崎前往《二十世纪之支那》编辑部，同宋教仁、陈天华等人进行了会晤，孙中山根据以往的经验，阐明了革命要相互联络和联合的重要意义。大家一拍即合，于是开始讨论组织联合的统一革命团体问题。第二天，黄兴邀请在东京的华兴会会员讨论与兴中会联合的

事，陈天华赞成，刘揆一反对，黄兴提出可在形式上加入，但在精神上要保持华兴会的独立性。最后决定，加盟与否，由个人自定。

这时，关于统一革命团体的问题，已经是人心所向，如同百川归海一样了。湖北、四川、广东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也先后拜会了孙中山，拥护他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

7月30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约集，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在内田良平住所、东京黑龙会会址集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的事。

这是中国革命者一次史无前例的群英大聚会。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和个人，除甘肃省没有留日学生外，全国内地17个省都有代表到会。

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他屈腿盘坐，微笑颌首向大家致意。黄兴非常兴奋，首先致词说道：“孙先生最近从欧美回来。现今天下大势如何？中国革命怎样进行？我们请孙先生发表意见。”

大家屏息静听，全神贯注。

“中国革命方法，大概不外是联络人才一事。中国现在不必担忧各国瓜分，但要担忧自己的内讧。如果这一省要起事，那一省也要起事，大家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各国必然乘机干涉我国。这样，中国必亡无疑了。所以，依我看来，我们应该以互相联络为首要的事情。”孙中山首先向大家阐明革命的理由和实行方法，提议将分散的各个革命组织结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

孙中山端庄的仪态，革命的激情，伶俐的口才，使听众如醉如痴。热烈的掌声不断打断他的讲话。

“一切破坏之前的建设，破坏之后的建设，件件事情都得由同志去做。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文明的政府。”孙中山站起身来，打着手势，慷慨激昂地说着。

大家心驰神往，聆听孙先生描绘着中国的美好前景，简直给迷住了。好一会儿，才响起连续不断的掌声，孙中山的倡议一致通过。

结成全国性革命大团体，是大势所趋了。《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革命大团体该起什么名称呢？

孙中山豪情满怀。他提议：“新的革命组织就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怎样？”

大伙沉思着，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黄兴经过深思熟虑，慢慢地说道：“我们现在侨居它国，行动必须隐蔽，革命二字一出，同志活动更是不便。从有利革命出发，建议把‘革命’二字删去。”

众说有理，孙中山也向黄兴点头微笑，表示赞赏他的观点，接受他的意见。

这时候，有人高声喊道：“既然我们以驱除清廷为己任，当与对象立名。”遂提议新统一的革命团体为“对满同盟会”。

“不，不应该这样立名，”孙中山站起来说：“满清政府腐败，我们才起来革命。但我们革命的宗旨，不是专在排满，而是废除君主专制，创建共和。”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中国同盟会”的名称才确定下来。

讨论到同盟会的宗旨，又是一番争论。

孙中山首先提议：“中国同盟会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这时，孙中山毫不迟疑地站起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受，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所以成为这样不平等的世界。欧美为什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平均地权即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步，我们的组织为世界上最新的革命组织，应当高瞻远瞩，不但解决民族、政治两大问题，还必须把将来最困难的社会问题一并解决了，以便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世界上最良善富强的国家。”

这个愿望是多么善良和真诚啊！到会好多人士纵使对“平均地权”的必要性不理解，或者不大赞成，但孙中山的理想、激情和理论，还是使大会通过了他提出的“四纲”。

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提议：“请自愿入会诸君签名。”倾刻间，会场变得一片宁静，厅外吱吱喳喳的鸟语显得格外清晰。大家有的低头沉思，有的仰望天花板，有的你看我、我看你，黄兴目光四射。孙中山微笑、期待。

这时候，刚从湖南到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边走边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他走到桌旁，爽朗说道：“我凭良心签名。”说罢，写上“曹亚伯”三个大字。“我也凭良心签名”，程家桢跟着前来，大家拥到桌边，按次签名。

大家签署了盟书之后，再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由孙中山领导大家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宣誓完毕，孙中山与会员一一握手，兴高采烈地说：“为诸君庆贺，自今天起，各位已不是清朝的人了！”说罢，又告诉了今后同志间联络的暗号：问何处人？何物？何事？要分别答汉人、中国物、天下事。最后，大家推举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8人起草会章，待召开成立大会时讨论。

会议临近结束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几个同志顿时人仰马翻。大家大吃一惊，上前一看，原来是由于会场人数过多，动作活跃，后厅地板塌陷。孙中山似有所悟，风趣地笑道：“这是颠覆满清的预兆。”众人鼓掌欢呼。

1905年8月11日，留学生会馆门前张贴着定于13日下午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的告示，当时虽说正值暑夏，许多留学生已出游或者回国，可那天下午，留学生们竟蜂拥而至，会场富士见楼挤满了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身穿洁白西装的孙中山，由宫崎滔天陪同，从容步入会场。刹那间，会场内外，掌声雷动。人们踮起脚后跟，争相一睹孙中山的丰姿。

在会上，宋教仁首先致了欢迎词，接着孙中山作了生动感人的演说。他从清帝入关，一直谈到当时，满清是怎样残酷地压迫汉人的，列强是怎样地贪婪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是怎样反清抗洋而又屡战屡败，最后得出结论，只有推翻清廷，反抗列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才能使中国免于灭亡之境，臻于富强之境。

孙中山那慷慨激昂的演说一讲就是4小时，句句打动人们的心弦，一再激起热烈的掌声。听众时而愤怒，时而悲哀，当讲到革命前途和祖国光明前景时，又都显现出笑容。参加这次大会的满族青年学生，感受也特别深，其中好几个人当场流了泪。最后孙中山号召大家发奋图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那么 10 年、20 年以后，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中华民族一定会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当时清驻日使馆扬言要取消与会者的官费。面对这种威胁，他们嗤之以鼻，毫不在乎：“要取消就让他取消好了。”有的回答更干脆：“我无论如何要革命。”他们甚至还去论理，弄得使馆官员只好无可奈何地说，算了算了，我今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了。

火山爆发式的革命激情是压抑不住的。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 300 多人。大会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同盟会章程》。章程中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宗旨。大会公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本部设在茫洋，本部之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并决定以 1905 年由宋教仁等人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

同盟会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入，会员人数大为增加，不到一年，列名的会员总数已达 1 万人以上，会员主要来自海外华侨和会党分子。

1905 年 11 月 26 日，同盟会将其机关刊物改为《民报》，胡汉民为主编，在日本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首次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之后，孙中山又在《同盟会宣言》和《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讲演中，对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是反满和建立汉族人当权的资产阶级统一的民族国家，实行民族革命。民权主义的核心目标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完成所谓政治革命。民生主义就是要用平均地权的办法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和对立，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这样同盟会的纲领经过逐步阐发而趋于完备。

这样，灾难深重的中国经过无数仁人志士的艰苦探索和努力，建立起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有了一个指导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有了一位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孙中山。队伍扩大了，思想明确了，革命者汇集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又义无反顾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自同盟会一成立，孙中山和他的盟友们立即发动力量，继续批判康有为等人的保皇谬论，发展各地同盟会组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抛头颅，洒热血，不屈不挠，直到取得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

凡尔赛和约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求和代表埃茨贝格与协约国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在法国巴黎东北部的贡比涅康边森林签订了停战协定。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此结束。

战争的结束，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获得战争胜利的协约国急于按照新的实力对比夺取战败国的领土及其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蓬勃兴起，这使协约国帝国主义面临一种新的形势。为了进行分赃、反苏、镇压各国革命运动从而建立起帝国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了战败国缔结和约的会议，这就是所谓的“巴黎和会”。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大厅正式开幕。参加和会的有27个国家的代表团。中国作为战胜国，由当时的北洋政府派外交总长陆征祥等五人参加，苏俄由于帝国主义的敌视，没有受到邀请。德国及其盟国也不准出席会议。鉴于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呼声，帝国主义当时大力宣扬“和平”、“友爱”、“平等”、“独立”，似乎和会的目的真是为了缔造“永久和平”。然而，它们在和会上的所作所为，撕去了自己华丽的外衣，暴露出本来的丑恶面目。

与会国的代表权首先就很不平等，参会国被分成四类，这四类中，唯有美、英、法、意、日为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他们有权出席一切会议。而中国等大多数国家，只有在涉及到自己的问题时才能参加或有可能被邀请参加。与会的代表，五大强国各有五名代表，大多数国家只有一二名代表，少数国家有三名代表。和会的会议也有三种：一是最高会议，由五大强国首脑和外长组成，也称“十人会议”，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它来决定；二是专门委员会，由有关国家的代表组成，审议各种专门问题；三是与会国全体代表大会，但它在整个和会期间仅举行过七次，而且只是形式上举手通过而已。操纵大会的是“十人会议”。即使如此，帝国主义仍然认为“十人会议”人数过多，不便进行秘密磋商，于是在1919年3月成立了由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和奥兰多组成的“四人会议”。日本代表西园寺因不是现任政府首脑被排斥于外，而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在“四人会议”上大受冷落，他于4月20日因阜姆问题退出会议，最高会议就变成了“三人会议”。可以说，在和会各个阶段真正操纵大会的是美、英、法的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三巨头”。

和会的第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建议，作为他鼓吹的和平计划“十四点”中的一枚重磅炸弹。他想借助于“国联”确立美国的霸权地位。英、法却竭力主张先讨论如何瓜分殖民地与领土。法国一心想肢解德国，使其在经济上、军事上遭到最大限度的削弱，则自己便可稳居欧洲霸主宝座。因此，它不仅要求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煤产丰富的萨尔矿区，还竭力主张取得莱茵河左岸地区，以莱茵河为界建立一个独立的莱茵共和国，成为依附法国的缓冲国。英国一向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政策，不愿过分削弱德国而致使法国过分强大，所以反对法国分割德国的企图。美国出于同样的目的，也反对法国此议。法国反对美国干预欧洲事务，英国也反对威尔逊“十四点”建议中“海上航行自由”的原则，以保持自己海上

霸权，这些主要战胜国代表在整个会议期间为取得最大之利益竭尽攻击谩骂之能事，甚至互以退会相威胁。经过三个多月的争吵，分歧各方终于妥协，于同年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这便是医治战争创伤的“良方”。公正地说，应该称之为屠夫和掠夺者的条约。

“清算的时间到了。你们向我们请求和平，我们同意给你们和平。我们现在就把这项和平的文件交给你们”。这是5月7日，与会各国代表齐集凡尔赛宫时，大会主席克里孟梭对被允许最后一个进入会场的德国代表说的一番话。

《凡尔赛和约》共15部分，440条。国联盟约作为第一部分而冠于《凡尔赛和约》之首。第二部分以后为对德和约。

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萨尔煤矿所有权和开采权让予法国，萨尔区的行政管理由“国联”负责，为期15年，期满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归属，重新确定德国的疆界。德国莱茵河西岸由协约国占领15年，东岸50公里内为不设防区。

德国承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将波兹南、西普鲁士大部分和上西里西亚的一部分以及穿过德国领土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的狭长出海口“波兰走廊”割给波兰。古尔琴地区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欧本和马尔美迪割给比利时，德国与丹麦的边界什勒斯威北部划归丹麦。默麦尔先由协约国占领，1923年交还给立陶宛。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德奥永远不得合并。根据这些条款，德国本土丧失了八分之一，人口减少了十分之一。

德国的全部殖民地由英、法、日、比等战胜国以委任统治的方式加以瓜分，德属东非的坦噶尼喀为英国所得；多哥、喀麦隆被英法瓜分；卢旺达和布隆迪转归比利时，德属西南非由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统治，德属太平洋岛屿中，赤道以北的马绍尔、加罗林、马利亚那三群岛划归日本，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划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西萨摩亚划归新西兰。德国还被取消了在中国、埃及、摩洛哥、利比里亚的特权。

和约并对德国的军事问题作了规定，德国陆军以10万人有限，海军人员则不得超过1.5万人。德国不得拥有军用飞机及潜水艇，必须解散参谋本部及类似机构，取消普通义务兵役制，军舰数目被限定。禁止生产和输入坦克和装甲车等重型武器。协约国之所以还允许德国保留一定军事力量，决非出于同情，而在于用来镇压德国的革命力量并阻止苏俄向西发展。在此之后，德国明里暗里发展军事力量，协约国一心将其引向苏联，所以就睁只眼闭只眼不闻不问，这是后话，且不细说。

和约规定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德国如何赔偿战胜国因战争而遭受的一切损失。这是一个最为敏感、引起纠纷最多的问题，和约没有规定赔款总数，它将由一个赔偿委员会在1892年5月1日前予以确定，在此之前，德国应交给参战国200亿金马克。

和约还规定：德国关税不准高于他国。战胜国可以自由地向德国输出货物而不受任何限制，易北河、多瑙河、奥得河、维斯瓦河、涅是河等特定水域，被划为国际河流。

另外，和约还规定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德国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者。

和约草案交给德国代表团后，德方曾表示条件太过苛刻不能接受，协约国遂以战争相威胁，并发出最后通牒，德方被迫屈服。

和约使德国陷入了经济破产、权力丧尽的困境。德国人民对沉重的屈辱

感到愤怒。战胜国的和约没有缔造和平，却播下了新的战争的种子，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一旦战败国军事力量复兴，战争便不可避免。而事实上则是：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从签约的第一天起就下定了毁约复仇的决心，并为此而日夜经营，准备再图世界霸权。

战胜国强迫德国承认了《凡尔赛和约》之后，又相继同德国的盟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这些和约以《凡尔赛和约》为中心，按照各国新的力量对比，构筑了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即凡尔赛体系。战胜国企图利用这一体系稳定重新瓜分世界后的新秩序，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它只是暂时缓和了列强之间的矛盾，在这段缓和过程中，矛盾有增无减。

美国因为在殖民地问题上没有得到好处，“海上航行自由”的原则也被和约弃之不顾，所以大为不满，美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使美国游离于体系之外，这就加剧了美国同英国、法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

美国总统曾因提出“十四点”和平建议而被一些人捧为和平的“救世主”，他首倡的“国际联盟”也被写进和约并于1920年1月10日正式宣告成立。但作为“创始者”的美国，却置身于联盟之外，“国联”成了英法用以在国际关系中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美国对此深为不安，并力图采取行动扭转局势。

巴黎和会主要是解决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凡尔赛体系也只确立了战后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而对此，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列强之间的矛盾已趋激化。

凡尔赛体系主要是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各国在西方的力量对比关系，至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帝国主义还未来得及根据其新的实力对比建立起一种新秩序。随着德国海军力量的覆灭，帝国主义的海上竞争就从北海和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上来。因此，巴黎和会后，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就特别地尖锐起来。又由于战前的六大列强中，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摒弃了沙俄的侵略政策；德国因战败被迫退出了这一地区；法国忙于医治战争创伤以巩固其欧洲的地区，无力插手东方，所以战后帝国主义对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主要是在美、英、日之间的展开。

战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它要求按照它的实际力量来重新瓜分世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美国同英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英争夺构成战后帝国主义矛盾的焦点。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美日矛盾则是主要矛盾。

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遇到了有力的阻碍：日本成为它强硬的对手。战争期间，日本乘欧洲列强疲命战争无暇东顾而大兴扩张，加紧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入侵，并力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凡尔赛和约》使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与太平洋三大群岛，这一切无不使美国感到恐慌，阻碍了美国对远东地区扩张的计划，从而大大加深了对日本的敌意。

美国企图遏止日本独霸中国之企图，而日本则以“亚洲的门罗主义”相对抗，决不放弃自己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两国间的矛盾已经恶化到公开谈论军事冲突可能性的地步。美国宣称它拥有最广大的需要保护的区域，由此它要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日本不甘示弱，拿出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作为海军军费。

最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当然不能无动于衷，它拥有最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因此力图确保其海上霸权地位。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说：“英国将耗费最后

一文钱，使英国的海军优越于美国或任何一国的海军。”这样，美、英、日在争霸远东太平洋地区中，虽然矛盾十分尖锐，达到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程度，但由于双方都没有准备好进行战争，同时又由于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反战运动，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汇合成巨大的革命风暴，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在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对此，帝国主义认为有必要调整他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以消除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浪潮，维护殖民统治，堵上凡尔赛体系遗留下来的这个东方缺口。于是，一次新的国际会议——华盛顿会议应运而开。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了华盛

顿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召集，有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九国参加，旨在讨论限制军备及太平洋与远东问题。美国人在会上占主导地位。英日同盟虽未列入议事日程，却是美国要讨论的首要问题。因为，美国人认为英日同盟是他们在远东和太平洋上的一个最危险的因素。日本在英国支持下对美国形成严重威胁。会前美方就对英方施加压力，会议开始后，美方又与英日代表进行秘密谈判。英国不想使英美关系尖锐化，又企图保留英日同盟，遂主张结成英美日三国同盟，美国拒绝这一变相保留英日同盟的建议，而坚持把在对德问题上与英国有矛盾的法国拉入其中，以增强自己的地位。各方斗争和妥协的结果，便是《四国条约》的产生和英日同盟的失效。四国在太平洋上的现状固定下来，矛盾有了暂时的缓和。

接下来，美国又在海军军备问题上向英日提出挑战，美国率先提出自己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方案，使自己拥有与英国同等的主力舰吨位。英国由于战后经济实力削弱，无力于美国竞争，同意美国的提议，但要求取消潜艇，削弱法国，法国寸步不让。日本在英美联合压力下被迫接受美国建议，但也得到了英美不得在距日本5000公里以内地区设立海军基地的承诺。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签订了《五国海军条约》。英国海上优势地位开始丧失，日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美国取得了又一重大胜利。

但美国忘不了它在远东的主要目标中国。门户开放原则仍被作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它强调各国不得谋求在华的独占权或优先权以妨碍机会均等政策的实行，旨在打击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扩大自己在华势力。日本代表拒绝在大会讨论“山东问题”与“二十一条”，要求在会外通过中日双边谈判解决。英美因为切身利益作出让步，派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从中斡旋。1922年2月6日，与会九国签订《九国公约》。公约在形式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实际上没有任何具体保证。它的核心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日本的对华野心遭到挫折，公约“又使中国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华盛顿会议解决了巴黎和会没有解决的问题，调整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确立了列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新秩序”，完成了对凡尔赛体系的延续与发展，从而完成了战后世界范围内列强的力量对比体系，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是这次会议的最大赢家。通过条约，美国打击了日本对中国的独占，并企图凭借实力使自己在华得到发展，这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失败和美国外交的胜利。中国从此又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局面。《九国公约》实质上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宰割中国和反对中国人民的同盟条约。

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它在承认美帝国主义占优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从而最终形成了战后帝国主义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体系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但是，它所带来的帝国主义“和平”，并不是友好的和平，而是武装的和平，是帝国主义战时政策的继续，是帝国主义两次战争之间的休战。它是建立在火山上的，从最初起就潜伏着矛盾、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因而，它的最后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凡尔赛和约》曾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赔款。围绕赔偿问题，战胜国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各方都欲按自己的意图来处理，以谋得最大好处。

法国一向视德国为眼中钉，决意获得最大限度的赔款，以德国的被过分削弱来壮大自己争取欧洲霸权的力量。英国希望德国不致于被赔款问题压垮，而给英国资本家留下赚取利润的地方，也成为英国抑制法国的据点。美国远离欧洲，一心想把解决赔款问题的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只有这样，它才能理直气壮地介入欧洲事务，确立自己发号施令的地位。

根据和约，1921年4月，英、法、意、比四国组成的赔款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德国必须在30年内赔款1320亿金马克，法国独得一半还多。

德国政府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决定采取“履行和约”政策。即表面上德国承担赔款责任，实际上破坏赔偿，使其无法进行。在掏出第一次赔款之后，德国政府授意大资本家将资本转入国外，并滥发没有任何担保的纸币来弥补国家赤字，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德国财政状况极度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请求延期支付赔款。

英、美出于自身利益，同意德国延期赔款并减少赔偿总额。法国表示坚决反对，它在赔款份额中得到的比例最大，且因国内困难重重，迫切需要资金补充。法国垄断财团决意加强对德掠夺，于是便以德不履行和约为借口，伙同比利时，出兵占领了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

法国对鲁尔的占领，遭到了德国政府的抗议和德国民众的抵制，英美也反对法国的这一行动。占领期间，德国经济陷入混乱，人民革命情绪高涨，法国生产也急剧下降。英美乘机向市场抛出大量法郎，使本已恶化的法国财政陷入更深的困境。法国为自己的占领军支付了10亿法郎的军费，一无所得，还丧失了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

1924年1月14日，国际专家委员会在美国专家道威斯领导下开始工作，此后制定的道威斯计划便将《凡尔赛和约》打破了一个缺口，为德国经济的复兴提供了契机。

道威斯计划大大削减了德国每年的赔偿额，并未规定总数，最具决定意义的是，计划允许德国从英美那里得到贷款，以稳定德国通货从而提高赔款能力，事实上，德国得到的贷款远比付出的赔款多，大部分贷款用来资助了德国垄断资本。德国在源源而来的美国资本扶助下，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到1929年，德国工业产量再次超过英、法，居于美国之后，列资本主义世界之第二位，德国垄断资本再度成为英美垄断资本竞争的劲敌，经济的复兴，随之而来的便是军事与政治的复兴了。英美修改了《凡尔赛和约》也就动摇了他们苦心营建的凡尔赛体系。德国人完全可以相信，他们的争吵不休的对手正热衷于向自己提供复仇的机会。

德国经济走向正轨，政府的第二步目标便是恢复自己在国际关系中政治大国地位。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法国深感其宿敌德国一朝崛起，又可能对自己进行侵犯，因此在战后的头几年内，它一直致力寻求边界安全保障，先后与比、波、捷三国结盟，但这种方式作用不大。法国在鲁尔占领失败之后，汲取教训，决定改善法德关系，以解决安全问题。

关于安全问题，“国际联盟”在1924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大会上提出集体保障安全公约草案，通过了《日内瓦协定书》，规定议定书的参加国彼此不进行战争，保证维护《凡尔赛条约》规定的领土，其中包括维护法国的东欧盟国边界的现状。法国对此十分满意，第一个在议定书上签了字。然而这一议定书的内容，却同英国削弱法国、保持法德平衡的政策，以及尽量避免在欧洲大陆承担义务的意图不相符合。英国新上台的保守党内阁拒绝签署，使议定书终于流产。

英国对安全保证问题有自己的打算。英国认为要防止德国倒向苏联，利用德国反苏及对抗法国，就必须对德国作出某些妥协。同时，英国也想通过一项条约来解除法国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修复一下自从法国占领鲁尔以来趋于恶化的英法关系，于是英德频繁接触。1925年1月20日，在美国的劝告下，德国政府分别向英法发出备忘录，提出签订莱茵公约，规定在英国担保下，与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所有国家共同保证维护莱茵地区的领土现状，保证用和平手段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德国则承认《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西部边界的划定。在美英的压力下，法国基本同意了德国的建议。

1925年10月5日~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等七国在瑞士洛迦诺举行了会议，美国未派代表参加，但表示支持英国。会议签订了最后协定书和其他七个条约。这些条约总称为《洛迦诺公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莱茵保安公约。

公约规定德、比、法相互保证不破坏《凡尔赛和约》中所规定的德法、德比之间的领土现状，不得违反《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非军事区的现状，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保证国承担援助被侵略国的义务。公约还规定只有在德国加入“国联”后方才生效。1926年9月，德国根据公约的要求加入“国联”，并且在“国联”理事会担任常任理事国。

洛迦诺会议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又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德国在英美支持下加速复活军国主义的势力。希特勒上台以后，大大加快了这一步伐。

1932年2月2日，“国联”主持的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开幕，与会各国口称赞同裁军，而实际上各有打算。

德国代表团表明：“德国政府同德国人民一样要求全面裁军。德国人民要求实现各国人民的权利平等和安全平等。”因此，他们建议把《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军备数量上和质量上的限制普遍推广到所有国家。对此建议，意大利、英国、美国都表示同意，目的旨在反对法国称霸欧洲。法国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因此主张维护现状，但得不到英美支持，德国便以退会相威胁，法国只好妥协。德国再一次取得胜利。

此后，德国政府加紧行动，大力扩军，并以裁军委员会不许其将军队扩至30万为由，退出裁军会议。几天后，它又宣布退出“国联”。崛起的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已决定公开进行大规模扩军备战。

希特勒采取了军事冒险的策略。1935年3月13日，戈林宣布德国重建

空军。西方国家对这一破坏和约军事条款的重大挑战视若不见，希特勒的勇气受到鼓舞，接着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实际上，德国早已建立了数量庞大的武装力量，西方国家因为其尚未涉及自身利益，不愿出头惹麻烦而已。一战的果实《凡尔赛和约》就这样在它的制定者的漠视下，被德国人用战争的狂热开始摧毁。

希特勒冒险成功，继而又对各邻国大加安抚，声称德国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它愿意保证除苏联以外的德国所有邻国的安全。英、法、意虽对德单方面废止《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行为提出抗议，却仍幻想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可以成为反苏的主要力量，因而实际上是纵容德国重新武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破坏和约的正是协约国，而非德国。当时，法国曾表示，如果德国再有违反和约之举，应对其进行军事制裁。英、意却表示他们决不会为和约的命运采取什么制裁行动。这只能表明，协约国对于和平并不存在真正的诚意，只要对自己有利，和约的存废无关紧要。《英德海军协定》便是一很好的佐证。英国为利用德国反对苏联和平衡法国力量，不惜勾结德国共同破坏和约。通过这一协定，德国则可“合法”地建造大型军舰，如果形势需要，它还有权建造与英联邦吨位相等的潜艇——只要征得英国同意即可。

希特勒看准了协约诸国的心态，遂决定派军队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宣布德国不再受《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区的全部条款和《洛迦诺公约》的约束。法国也没能采取相应的制裁行动。以法国当时的军力，完全可以将德军赶出去，但它选择了“和平”，英法的一纸抗议照会算是为《凡尔赛和约》的不幸作了一点无可奈何的表示。

战争的风云，已经罩满了欧洲。

日本一直梦想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并于一战期间扩大了它在华的势力，但华盛顿会议和《九国公约》的签订，阻碍了日本妄想吞并中国的野心。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为了摆脱经济困境，日本加紧扩军备战，谋求用武力夺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公然出兵中国东北，企图把东北地区变为其独占殖民地，并进而侵占全中国。这是一战后公然用武力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行动。发动战争的是日本，日本完全为了自己的需要发动对中国的战争。

英、美在其在华利益未受威胁之前，姑息袒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让日本把矛头再指向苏联，但日本的继续进攻，使他们深感不安，这才出面敦促中、日双方停战。

“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调查中、日冲突根源。报告书并建议不予承认日本拼凑的“满洲国”。“国联”基本接受了李顿调查书的意见和建议，声明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日本声明它与“国联”的见解完全相反，并以此为借口，宣布退出“国联”，亚洲战争策源地从而形成。

战后的一系列和约，所谓的体系，只是根据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而形成，绝非是为了什么和平。一旦他们的利益发生了根本的冲突，战争就会降临。而无论是巴黎和会，还是华盛顿会议，都从根本上加深了列强之间的矛盾，所以，名为“和约”，实际上是“战约”。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

连英国人自己做梦也不曾会想到，他们这样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几千年来世界上一个极其伟大的神话。

中国人自己更不会想到，在长达二千五六百年之久的封建时代，被侵略者的炮火轰开，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随后在 110 年中遭受列强的侵略。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才结束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一个看似弱小实则充满活力与杀气的文明最终让一个貌似强大实则已衰老陈旧的文明在自己面前低下了头。这是一个充满暴力与血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过程。

鸦片战争就这样拉开了这一过程的帷幕。

1792 年，当英国派马嘎尔尼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威震四方的大国正处于逐渐衰弱之中。虽然已近黄昏，但它千年未逝的金壁辉煌仍然镇住了这位前来探听中国虚实的英国使臣。

但历史无情地使余辉渐渐走入黑暗。一个极其明显的对比便是：当从黑暗中世纪的噩梦中醒来的欧洲人甩开手脚行进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大道上时，仍然沉陷在大国迷梦中的中国社会还在封建路途中蹒跚而行。

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古老大国实在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事实不在于这个辽阔的土地上所发生的许多震动世界的大事，而在于这块土地本身被牢固地统一在一起。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也曾出现几次分裂，但这种短暂的分裂从另一个意义上更加加固了这种统一。虽然国家的巨幅员和各地域之间的差异时常助长分裂，如黄河、长江、秦岭所形成天然地域隔绝，但这些因素并不能阻止中国走向统一，实际上这些天然地域隔绝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却并不单纯建立在专制制度之上。另一个明显而深层的统一是中国文化在空前广阔的领域中的共通性。以精耕细作的农业、严密组织的家庭生活和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为特征，中国这一逐渐扩展的文明就赋予整个国家从南到北、自西到东的一种内在的共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几乎都闪耀着光芒。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共通性的观念，是中国生活方式从新石器时代就不间断地延续下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连续性造成的。以农业经济——官僚政治为突出特征的中国，似乎任何变化和革新都不能打破它的这种连续性。

在 7 世纪到 13 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到了 16、17、18 世纪，也就是明朝（1368—1644 年）的后期和清朝（1644—1911 年）的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欧。

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的。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作用。”

中国的封建专制皇朝从来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同时它自己又是全

国最大的地主。他们掌管着田地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给自足，与外部世界隔绝，形成了唯我独尊的观念。中国历代均把对外关系仅仅看作是“宣扬天朝国威”的一种形式。对外贸易不仅从来没有受到过重视，反而屡次遭到禁止。乾隆三十四年（1759年），清朝政府限定只开放广州一地，外国商人到广州后，他们的买卖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他们称为“洋行”），并组成一垄断性的组织叫做“公行”。并且对外国人的行动也有严格的限制。到了19世纪的清王朝，由于千百年来自给自足和自鸣得意中形成的惰性和保守排外思想，已经使它难以再往前迈进而陷入历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了。

清王朝此时强硬的闭关政策及千余年沿袭下来的文化心理与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欧洲大相径庭。当它仍然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国内生活的时候，欧洲早已对整个世界虎视眈眈。清王朝信仰经典的儒家教义和天子在整个世界中至高无上的权利，皇帝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用德行来统率他下面的臣民。在这个礼仪之邦，道德高于一切，它几乎掩盖了所有充满欲望的东西，甚至掩盖了法律条文。责任从来就被作为基本的要素而将权利驱逐到一旁。这种看法与欧洲人有着极其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形成之后。与中国相反，欧洲人很少具有唯我独尊，整个欧洲大陆经常处于分裂和敌对之中。没有竞争便没有生存，这是他们最起码的信条。地理环境的分割起到了非常明显而重要的作用。除了自己的民族之外，他们对任何外国人都缺乏信心。从无数战火中延续下来的他们显然也形成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相对于中国来说则更加具有斗争性和富于生命力。在这里面，法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道德的地位，个人的权益也明显比对社会的责任强调得多，虚无的上帝观念代替了中国实实在在的皇帝权威，国王随时有可能被反对者推倒。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平静的农业社会和讲求仁义的政治领域中可能培养包括运用暴力在内的个人才能和进取心。在欧洲他们确信一条原则，那就是：暴力为进步服务。因此，当中国的官僚们在大倡四书五经、农民们在埋头辛勤耕耘的时候，欧洲人却在忙着环绕地球、探险和海外移民。他们热火朝天的扩张主义与中国一潭死水的闭关政策形成了显著对比。

欧洲人显然比清朝中国提前迈出了一步。尽管差距明显，清王朝却毫无知觉。但这两种几乎是水火不容的文明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上的相互碰撞是无法避免的。清政府构起了一堵隔绝世界的堤墙，抱着本来早已应当成为历史的文明，以为任凭外面风云变幻，自己尚可关上“天朝”大门，不闻不问，高枕无忧。但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真正碰到撞击时，只能使本来就虚弱的自己更加惊慌失措。清王朝这种毫无应变的心理和做法使它在这场斗争中更增添了不少悲剧色彩，甚至可以说是使一个本来可变得简单些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清王朝的麻木不仁，注定了要遭受外来的剧烈撞击的命运。

在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以英国人为主，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增加向中国贩运鸦片。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这时每年已有1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到了嘉庆年间（19世纪初期），每年输入量增加到4000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年间，每年多到4万箱左右（每箱100斤或120斤，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每一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格按质量高下为400银元到800银元）。

战前，在正常贸易中，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和印度棉花，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由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英国不可能在中国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因

而出现贸易逆差。英国商人曾努力向中国推销棉纺织品，但销路很小，改变不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商品。它的售价比成本高得多，而且它具有这样的特殊性质：人们只要吸鸦片成瘾，就不能不经常地、愈来愈多地需要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吸毒成风，就会成为鸦片的广大市场。因此，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成为英国商人追逐高额利润，并改变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

这个极易使人上瘾的物品很快在中国流行起来。几乎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都拿起烟枪吞云吐雾，甚至军营里的士兵也爱上了这个东西。据统计，在虎门硝烟前，大约全国人口的 3% 有着很大烟瘾。鸦片的猖狂流行，使统治者内部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了，人们清楚地知道几乎每个政府官员都吸食鸦片或因鸦片而腐败。他们对于白银外流的考虑则比对道德沦丧的考虑相对少得多。但直到林则徐到虎门禁烟以前，清政府从未采取过得力的措施禁止鸦片贸易。

“弛禁派”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反鸦片贸易的斗争。他们从贸易能增加关税的角度出发试图说服皇帝，并认为鸦片贸易已成为社会主流，无法禁止，不如就此放开，反会得到很多利益。这种“违法便废除法律使之合法”的做法遭到了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的反对。

1838 年 9 月，林则徐上奏道光，尖锐地指出鸦片流毒天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所列举的大量事实充分显示出鸦片在当时对于清帝国的危害。力图使自己成为治世明君的道光皇帝大为所动。1838 年 10 月，道光皇帝下旨，严令各省查禁鸦片。同年 12 月 31 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但清政府在下定禁烟的决心之前，并没有认真考虑是否会引起战争。道光帝相信林则徐的坚决果断会使英国人就范，必要时可动用武力。但他从没有对真正的战争进行过认真的考虑。

于次年 3 月抵达广州的林则徐立即显出了他严禁鸦片的决心和干练的作风。在经过密查暗访后，他于 3 月 18 日传谕外国商人，要他们在 3 日以内报告存贮鸦片数目并悉数上交，而且要声明以后来船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同时，他严正表示：“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绝无中止之理。”

林则徐禁烟由于态度坚决，得到了原来并不赞成严禁鸦片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林则徐到广州半个月后，通知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毫无通融余地。他还指明捉拿多年从事鸦片走私，恶名昭著的英国商人。由于他所采取的坚决措施，200 多英国商人终于在当年三四月间被迫交出了 20283 箱鸦片。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义律，不让英国商人把鸦片直接交给中国官方，而要先交给义律，再由他以英国商务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义律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鸦片纠纷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为下一步的阴谋作准备。他的这种做法恰好表明了英国政府是公然支持非法私贩鸦片的。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 1540 箱鸦片烟，同样经过义律的手转交。

1839 年 6 月 3 日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深重印痕的日子。广州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林则徐把外国商人交来的 2 万余箱鸦片全部投入了筑好的石灰池中，当众予以销毁。人群中愤激而又痛快的心情同池中沸滚的石灰水一起上

下波动。一些被邀请前来观看的外商则心痛地注视着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的东西在顷刻间化作液体流入大海，都摇头沮丧不已。虎门硝烟一直持续到6月25日，直到全部收缴鸦片均被销毁为止。

虎门硝烟，因为其成功地洗刷了鸦片泛滥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耻辱，而成为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一面大旗，维护了民族尊严而受到千百万中国人的崇敬和敬仰。但与此同时，它也使窥伺已久的欧洲人找到了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借口，中国近代的百年耻辱史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拉开了帷幕。

1839年7月，酗酒作乐的英国水兵在九龙尖沙嘴用棍棒打杀中国农民，林维喜因胸部重伤于次日死去。林则徐严格按照杀人偿命的原则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无理地拒绝，林则徐很快封锁了沿海交通线，断绝了英国船只的一切粮水供应。

义律决定用武力回答。9月4日，他率领四只战舰前往九龙，并通知清朝水师，如果在半小时之内不提供食物，他将击沉清朝水师的船队。林则徐和邓廷桢在军事上已经做了准备。时间一过，英军悍然开炮，清朝水师奋起还击，击溃了义律的船只。

义律很快又挑起了第二次战争。1839年11月3日，义律的船队与关天培的水师在穿鼻洋狭路相逢。时值英国皇家战舰萨克逊号路过，为扩大事端，义律对准皇家萨克逊号象征性开了一炮，立即将炮口转向中国船只。毫无疑问他达到了目的。萨克逊号同他的船队一起向中国水师发起猛烈的轰击。四只中国船只被击沉，关天培不得不下令驶离战场。

1840年2月（道光二十年正月），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所谓“东方远征军”开往中国。当时英国议会曾辩论对中国出兵是否合理的问题。下议院中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立场。

正式鸦片战争的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6月开始的。英国政府派出了自己的海军。并制定了明确的目标：绕广州向北，占领舟山岛，驶向天津向清帝照会。6月21日，16艘英国战舰、4艘武装汽艇及28艘运输船集合在澳门沿海以外。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林则徐已经在广州城外布置了严密的设防，许多新建的炮台准确无误地对着洋面。在这种登陆没把握的情况下，他们放弃了广州登陆的努力，按计划北上。

7月5日他们到达舟山群岛，这儿的守将事先没作好打仗的准备，很快便在慌乱中失掉了阵地。定海城很快便落入英国人手中。尽管如此，但这仍没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海盗突袭而已。然而，8月9日军机处接到英国船只继续北上的消息后才变得渐渐不安起来。8月30日，他们实在不能平静下去了。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来到了一触即发的天津大沽炮台。同英军谈判。

琦善在英国人面前大贬林则徐，把责任推到林则徐身上，希望英国人返回广东，等候清政府查办林则徐。琦善的许诺是代表清政府的主意。英国人于9月中旬回到了南方。同时，琦善作为钦差大臣也来到广州，查办林则徐。

清政府认为之所以有这样的战争，完全是因为林则徐没有采取妥当的措施处理好而造成的。但不管是谁在林则徐这一位置上，都避免不了同样的悲剧。要么是清政府改变政策，要么把英国人赶出去，这两方面当时都不可能做到。

林则徐被朝廷罢免后，在白河口“抚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和英国人义律谈判。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想在谈判中用延宕

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义律决定再度使用武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突然袭击和占领了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个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但是琦善立即求和，按照义律的要求，琦善赶忙于1月20日拟订了《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条款。英军随即占领了香港。

道光皇帝在知道英军硬要割地赔款以后，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原来他认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往南方，可见他们并没有多么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皇帝下诏表示决心在广东和浙江把英国人“痛加剿洗”。一个月后，他命令把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义律没有拿到《穿鼻草约》规定的赔款，又获悉清朝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二月上旬，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琦善的投降政策使许多官兵丧失了战斗意志，英军轻易地占领了虎门的十余座炮台和一千余尊炮位，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部抵抗，他在这一次战役中牺牲。

道光另外派出的3名高级将领到达了广州。他们是皇兄奕山、贵族隆文及抗白莲教“名将”杨芳。杨芳首先到达那儿。他认定英国人一定使用的是邪术，便想“以邪治邪”，收集广州全城马桶，绑于木筏上，率军向敌舰进攻。结果是邪不压邪，英国人仍然长驱直入。

当英国人占领广州城北面高地，将整个广州置于自己的炮口之下时，奕山想到的便只能是悬挂白旗了。英国人耀武扬威地驻进了广州城。无数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的罪恶勾当不仅在广州城内通行无阻，还扩展到了城郊。但他们在三元里碰到了麻烦。愤激的人群包围了这些狼狈的入侵者并杀死多人，逃窜回去的士兵连同他们的长官一起被10几万人包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是官方的阻挠，这场斗争将扩大到一个更广的程度。

战争由于英国援军的到来而局势更加明朗。清政府终于恐怖地认识到这些外夷居然具有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1841年8月，英军进犯厦门，守将颜伯焘本来做了极其充分的准备，使得英军正面登陆的希望再次落空。但一个狭隘的关口不曾被清军注意却被英军利用了。他们从这儿进了厦门城，几乎不费事就获得了主动权。而后的定海当然更加不堪一击。以2名士兵的生命为代价，英国人得以再次在这儿横行霸道。10月13日，宁波失陷。

攻陷宁波后的英军准备进入长江分割中国。这给清朝官员提供了新的希望。英国人不善陆战是他们由来已久的臆想。1842年1月，奕经成为浙江统帅。他在寺庙中抽到了一个皇道吉日，这天他派出了军队，不作美的天公降下瓢泼大雨。这支未曾出师先淋雨的军队很快在低落的士气中被英国人打得狼狈逃窜。

1842年5月，英军退出宁波和镇海，进攻乍浦，乍浦陷落。6月，英国人攻占了吴淞炮台。上海、宝山也相继被攻占。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率部抵抗，壮烈牺牲。由于两江总督牛鉴怯懦畏战，清朝官兵无抵抗地放弃了上海。接着，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四天后，越过长江的第一重门户的江阴炮台。7月下旬，镇江被攻陷。8月，英国舰队已经停泊在南京的下关。

急急忙忙赶来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鉴、在南京全部接受了朴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不敢有任何异议。1842年8月29日订立

了可耻的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次年7月，双方在广州虎门订立《五口通商章程》；10月订立《虎门条约》，均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

不管清政府承认与愿意否，它走向半殖民地的序幕已经被开启。2100万银元的赔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设英国领事馆、废除公行制度、秉公征收关税及五个通商口岸的设立则最终使英国人达到了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割让香港为英国领地也成为双方公认的事实被载入条约。这个损害中国主权，用炮舰外交的协议既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幕悲剧，也成为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它从开始到结束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欧美国家乘机索取特权。1844年春，美国政府派顾盛为专使，率军舰来华，强迫订立《中美望厦条约》，取得除割地赔款以外英国所获得的其他特权，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加深了对中国关税主权的侵夺。同年秋，法国政府的专使拉萼尼强迫订立《中法黄埔条约》，又增加了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自由传教的特权。此后，俄、葡、比、荷、西、普鲁士等纷至沓来，“均沾”了上述一切特权。1849年，葡萄牙赶走了在澳门的中国官吏，强占了澳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给外国人以名义上的贸易自由权，但实际上离他们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中国的明支持暗反对使他们的贸易在中国的土地上仍然是寸步难行。由于文化上的巨大鸿沟，英国所希望的中国出现法治精神下的贸易交往和国际交流，在中国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中国对自己千余年的古老传统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但这一点无疑上自君王下达百姓都会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鸦片贸易已经如火如荼了。清政府无奈的默许和英国人鸦片贸易不越上海的默契使英国人仍可获巨利，而中国却日见多灾多难。同英美等国长久打交道后的清政府终于逐渐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早已失去了霸主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引导一场变革。最多也就是形式上的改良。但即便走到后一步，中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彻底失败，才从更深的程度上刺激了这个古老的帝国。

1856年10月，英国海军借口广东总督叶名琛从英国商船“亚罗号”上捕获一名海盗（中国人）并处以死刑的事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旨在用炮舰获得更多的实际权利的战争看上去比较顺利。清朝军队几乎没有怎么抵抗便放弃了虎门炮台，英军一直打到十三行。叶名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最终于事无补。1857年12月，进攻广州的枪声再次打响。借口“马神甫事件”侵害了法国权利，法国人也加入到这场另有所图的战争中来。

1857年冬，5000多名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部属加强防卫的建议，不作攻守准备，致使广州陷落，叶铭琛自己也被俘虏（后被押赴印度囚禁，死于加尔各答）。

清朝曾试图对英国人在广州事实上的统治进行反抗。新任总督黄宗汉便暗中指使组成了广州民团，希望群众能够起来反对英国人。广东民团在1858年7月21日试图进攻广州，战斗一度极为猛烈。但占尽地利和武器先进的英国军队仍然最终取得了胜利。缺乏朝廷有力的支持，仅凭热血和勇气是不足以对付根基日深的英国人的。1859年1月，700名英军想摧毁民团总部，但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击败了英国人的进攻。在增援的1000余士兵和6艘炮舰的支持下，英国人最终达到了目的。他们几乎可以明目张胆地在广州恣意任

为了。

英法联军继续北上。1858年4月，英法联军抵达天津大沽港外。随时准备进攻天津迫使清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

1858年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天津。咸丰皇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跟英、法勾结而这时装作调解人的美俄公使，也随侵略军同来天津活动。清政府深恐侵略者进攻北京，全部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分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1859年6月，正当《天津条约》的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时，大沽战争发生了变化。一面和谈一面准备反抗的清政府组织了一次有力的反击。用外国大炮武装的炮台比过去具有更大的威力，在冲突发生后，英国军队遭到重大损失，432名英国官兵丧失了生命，4艘炮舰沉入了海底。这场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意志，也使得清朝政府相信自己仍然有能力击溃远道而来的洋人。

而对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由于遭受了这一从来未考虑过的失败而大受震动。1860年夏天，一支更大的带有明显战争意识的远征军来到了中国。60多艘法国船只载运6300多名法国士兵，140艘英国运输船载运着1万余名士兵，加上香港招收的苦力军，浩浩荡荡集合在天津口外。8月1日，联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陆。而后，严密设防的大沽炮台也没能够挡住他们猛烈的炮火和欲望。8月25日，英法联军开始进入天津。

清朝政府对来势汹汹的联军非常担心，但他们此刻仍然放不下架子和英法联军谈判。他们甚至在谈判开始之前仍然要维持外国使者进京所必须经过的那一套原来是朝贡制的礼节。英法联军同样也表示了对这场战争的执着。他们在一方面等待着清政府主动提出谈判的同时，一方面积极向北京推进，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直到他们到达离北京10几英里外的运河终点通州为止。9月21日，联军部队再一次打败清军，直逼北京城。次日，咸丰皇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逃出北京前往热河，留下他的兄弟恭亲王收拾残局。

进入北京城的英法联军在被这古老优秀的文明深深震撼的同时没有忘记在这个文明的地方留下些值得纪念的印痕。他们在北京城内疯狂地烧杀抢掠，抢劫和复仇般的破坏行为到处存在。在抢完圆明园的稀世珍宝后，他们又放上一把火，留下几块烧焦的石头作为历史的见证。

恭亲王奕欣只得面对面与这些骄横无礼却又奈何不得的敌人打交道。天朝大国的威信早已丧失殆尽。北京和谈的清王朝似乎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在侵略者面前软弱无力。1858年的条约内容被无条件地承认下来，并且又增加了赔款和将香港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中国的主权又一次从清政府的手中沦丧出去。

鸦片战争及其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中国社会在这次战争中经历一个巨大而痛苦的转变，即从一个封建社会的天朝大国到一个倍受欺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西方人则一步一步实现着他们的目的，他们不但获得了贸易中的许多特权，而且开始将这个辽阔的国家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我们可以从后面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悲惨的事实中找到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近代的影响。它带动了一个时代，一个充满屈辱和悲剧但又意义深远的时代。这场空前的冲突，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强烈冲突。这场冲突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场巨大的、无情而又缓慢的悲剧，因此它充满了痛苦。传统的中国文化及其形成的旧秩序为自己而战，但他却不得不在愈加深入的外来影响中退却。灾难接踵而至，一次甚于一次，甚至没有时间给它喘息和

反思的机会，封建社会的一切弊端在这场悲剧中充分暴露出来了，以至于许多传统中的精华也被迫接受一次极其残酷的考验。毫无疑问，这场冲突会给中国从一定意义上带来促进作用，但这个建筑在鲜血、屈辱、文明被粗暴践踏基础上的作用代价未免太大了。

外国侵略势力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他们的掠夺和扩张。1871年俄国占领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不到10年，又爆发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国进一步论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传统的中国自我形象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完全破裂。

鸦片战争，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给世界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的同时，无疑也加快了封建体制在中国的灭亡。同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化。中国在巨大的灾难中开始寻求自己富有活力的道路。

德国法西斯专政与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类的历史似乎总是充满了战争和暴力，但每一次战争的结束，人们总是希望和平永驻，但每一次的希望总是被下一次的战争打断，我们这个世界总有狂人想征服世界。

当希特勒率领的纳粹党徒们想征服世界之时，历史无情地把他们抛进了垃圾堆。

历史会告诉我们，希特勒曾做过的一切。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作为战败国，遭受其它帝国主义的宰割，既割地又赔款，使德国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战败的德国从来没有忘记要复仇，也从来不隐瞒自己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敌视，总是想着要去征服和摧毁它。而作为战胜国的英、法、意、美之间也充满着矛盾，也总是在不停的抱怨之中。实际上，这种体系是脆弱的、不牢固的。正如当年协约国方面的总司令福煦元帅预言的那样：“这不是和平，而是 20 年休战。”

“凡尔赛和约”的赔款问题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而从维护均衡状态的美英两国则在与法国争吵后，将赔款定在 1320 亿马克，后来又削减这个数字，这一数字对战败后的德国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包袱，而最后的赔款却是不了了之。英、法、美似乎谁也未曾吃亏，而德国却在这其中只赚不赔。因为输入德国的资金大大超过了德国需支付的赔款——而这些贷款在希特勒上台后又被一笔勾销了。资金加上德国高素质的人口，高度发展的技术和科学，使得德国很快东山再起。

德国的发展再次令欧洲人感到吃惊。从 1921 年上任的法国外长开始，希望将德国包容进现存的和平结构；而此时的德国则相信，与战胜国对抗是十分不利于德国的。因此，各国对用和平方式来调整“凡尔赛和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1925 年 12 月 1 日签定的“洛迦诺条约”是两次大战之间的转折点。来自英、法、意、德、波、捷的外交官们在瑞士的洛迦诺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的内容是德法边境和德比边境以及莱茵非军事区的安全不可受到侵犯，而英国和意大利则向波兰和捷克保证东部的争端采用国际仲裁来调停。这一协定真正缓解了一次大战。但在 11 年后由于它被撕毁则又成为新的大战的序幕。

这个协定使得德国在第二年得以进入国联并任常任理事国，意味着德国作为大国权利的恢复。事实上，德国依然需要支付战争赔款，依然没有海外的殖民地和有保障的市场，但是德国的重新崛起仍然意味着对当时和平结构的巨大威胁。德国在经济上的复苏，在暗中训练有组织的军队，保存有战争经验的军官，秘密制造坦克、飞机和装甲车——1929 年德国拥有 12 个飞机制造厂和 6 个飞机发动机制造厂，在坦克研究方面取得新的成果，而它在国联则大谈苏俄的威胁，声称表白自己毫无防御能力。

1929 年秋，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局面结束了。

这次危机是历次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拖延达四年之久。危机从美国开始，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特别严重的打击了现代资本主义最大的

国家——美国。在危机的袭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下降了44%，世界贸易减少了66%。到1932年底，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值下降到最低点，美国下降到1929年的53.8%，英国降到83.8%，德国降到59.8%，法国降到69.1%。危机不仅笼罩了工业，而且也笼罩了整个农业；不仅在生产和商业范围内闹得很凶，而且也扩展到信用和货币流通范围。这就使整个危机更加复杂和深入。

为了摆脱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就职后，在其阁员和智囊团的策划下，立即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称为“新政”。在实行新政的几年里，政府和国会先后颁布了700多个法令，涉及整顿财政金融、调整工业生产、限制农业生产、实行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举办公共工程和改善民众困境等各个方面。“新政”取得了效果，使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罗斯福不仅拯救了美国的民主政体，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改变了二战的结果而拯救了欧洲、美洲乃至世界，而且也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历史。

而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些国家本身的市场狭小，依赖于国外市场，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掌握大量财富的人都开始把目标投向国外——英、美、法的附属地。

作为德国和意大利，一开始便出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在日本，财阀们几经波折，最后选定了东条英机。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4月20日生于奥地利一个海关小职员家庭。早年流浪街头，混世渡日，也当过临时工、油漆工。他从小受到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的熏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参加了巴伐利亚兵团，在军队中服役四年，两次负伤，两次受奖励，混了个下士军衔。大战结束后留在部队当上了一名政治教官，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在此之前的“德国工人党”是一个不满30人的小党；如此之小，而经费只有7马克50芬尼。对于一穷二白的希特勒来说，加入这个党是个参政的机会。希特勒很快成为领导，他试图努力扩大影响，利用他熟悉的演讲术鼓动群众。1920年初，他在一次宫廷啤酒会上宣读了自己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废掉凡尔赛和约；建立民族的国家并采取社会改革。此后，希特勒将党名改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该党后来日益壮大。

随着法国对德国赔款的不断压力，纳粹党的势力愈来愈大，办起了报纸，讲演的听众增多了，而希特勒也被巴伐利亚总理召见，随后，希特勒成为第一主席。他用军队体制来组织纳粹党，他要求党员必须佩戴党徽，而纳粹的党旗是黑白红为底色，上面一个“卐”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解释为“红色是运动的社会思想，白色是民族主义，而‘卐’字代表斗争、革命，即争取雅利安人的胜利以及过去和现在永远是反犹太主义的创造性劳动思想的胜利。”

1922年10月，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们进军罗马而取得政权，使得希特勒党徒们在巴伐利亚趾高气扬。希特勒，还有他的得力干将戈林，将目光投向了魏玛共和国，保守派认为是魏玛共和国将德国的利益卖给了战胜国。鲁尔区被占引起的马克贬值使得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大受裨益，与之相反，人民并不知情，他们生活在贫困艰难之中，魏玛共和国则成了这一切的替罪羊，希特勒趁此良机将矛头指向巴伐利亚乃至柏林。

1923年，经过安排的冲锋队包围了慕尼黑的市民啤酒馆，当时巴伐利亚

总理卡尔和政界要人们在那儿聚会，卡尔还将向三千听众进行演讲，冲锋队在门口架上机枪，希特勒跳上桌子放了一枪，高喝：“全国革命开始了。”这一场面后世有着精彩的描述，卡尔等政府官员在枪口下表示效忠新的政府。

然而这次政变却是一场小小的纳粹党的孤家寡人的战斗，可怜的武装根本没有占领慕尼黑的战略重地。在慕尼黑卫戍部队的镇压下，政变闹剧般的收场。

“啤酒酒店暴动”失败后，希特勒及其党羽受到了审判。在狱中，他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极力鼓吹他的种族优劣论和民族复仇主义，又叫嚣应当使用暴力争取德意志种族的“生存空间”。这本书后来成为纳粹运动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希特勒出狱后决定采取议会斗争的形式。他拜见州总理，表示将在宪法允许范围内活动。

希特勒是一个组织才能非常突出的人。他将纳粹党组织成为一个“国中之国”，像军队一样严密而又错综复杂的组织。

1929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给希特勒带来了机会，混乱的局势加上共和国统治者们的无能，帮助了希特勒。经济危机使德国的借债来源断绝，而德国的金融机构无法负担，德国的出口断绝，这样，缺乏市场的工业无法开工，由此带来的贫困和痛苦所造成的困境打击了执政党。在1930年的选举中，纳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一选举结果使得纳粹党从此引人注目。它用口号来唤起德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并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这种煽动人心的方法是纳粹能够上台的重要手段。

希特勒取得胜利后，便紧锣密鼓的开始夺取共和国的领导权了。

1930年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从80.9万张选票增加到640万票，比之1928年他们获得的选票增加了近8倍，议席从12个增加到107个，1932年7月，议席又从107个增加到230个，从而变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团。

1932年3月到4月，德国举行总统选举，虽然希特勒是候选人，大选期间到处演讲，但最终还是选举了兴登堡为总统。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保守的大工业家阶级的支持下就任德国总理。

希特勒就任总理时，纳粹党并未在国会占绝对多数，他就马不停蹄的开始了攻击其政敌的斗争。纳粹党利用国家的各个机构、财力来宣传自己，相反，他们取消共产党的集会，封闭报纸。甚至不惜嫁祸他人，搞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来陷害共产党，冲锋队的队员们大打出手，冲散别的党派的聚会，而所有的这一些行为都是在内政部长、希特勒的死党戈林干预下做出来的。但国会再次选举的结果并未使纳粹党获得绝对多数。

由于“国会纵火案”的阴谋得逞，希特勒可以逮捕反对党的议员来获得国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修改宪法。1933年3月23日，国会以多数通过了授权法案，但实际上国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全部投了反对票，小党们则被希特勒拉拢过去，这并不令人惊讶，令人吃惊的是国会在召开的第三天，却通过了埋葬自己的法案——将立法权、国家预算的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和宪法修正权都移交给内阁，为期4年。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所谓“合法”的外衣下被埋葬了。希特勒成了独裁者。在而后不到2周内，希特勒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而德国的其他的政党都被消灭殆尽。随后工会被占

领，罢工通过法律形式被取缔——当然不是明言，希特勒的政府还在欺骗工人。希特勒的党羽们占据了政府要职。希特勒还向军队大献殷勤，调整军队和冲锋队的紧张关系，他向军队的将领们说，陆军和海军现在可以放手效力于迅速重新武装德国这项任务。

1934年，87岁的兴登堡去世，总统的职衔被取消，希特勒自封为国家元首，称德国为德意志第三帝国。从此，魏玛共和国就结束了。希特勒当上国家元首后，同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军队向其个人宣誓效忠，他成为完全的独裁者。

但是第三帝国的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失业人口在4年中减少了500万，国民生产则翻了一倍，政府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刺激企业，而更多的，则是重整的军备工业带来了繁荣——这种经济被德国将军们称为“战争经济”。德国鲁登道夫将军著名的《总体战》便是论证的这一事实。1938年，德国的钢产量超过了英法的总和，而铝则为英法总和的二倍多，德国一跃成为欧洲头等强国。

希特勒在建立法西斯独裁专政的同时，也加快了扩军备战的步伐。

希特勒曾经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描绘了一幅“大德意志帝国”的宏伟蓝图——首先是消灭法国，以保卫其“侧面安全”，然后是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部分波兰。以此为权力中心，建立一个从芬兰到高加索，从欧洲北端到比斯开湾，包括瑞典、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内的中小国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消灭大英帝国，占领法荷所属的殖民地，进一步向非洲、拉丁美洲扩张，最后使德裔美国人统治美国。

希特勒为了实现这个庞大的野蛮的泛日耳曼计划，一方面向全国人民灌输他的关于种族仇恨和暴力的思想；另一方面，利用“道威斯计划”对德国的扶植，迅速地恢复了经济和军事潜力。希特勒加紧推行加强武装部队和为其购买军火的计划，希特勒将陆军人数扩大了二倍，推行普遍义务制，随后将义务制服役期限扩大一倍，使军队人数翻了一番。1935年当戈林宣布德国成立空军时，全世界都未感到惊讶。德国空军在1939年生产的飞机比英法波三国的飞机总和还多。德国人还发现了如何从煤中提取汽油和橡胶——这两者是必不可少的，德国的对外贸易大大增加，物质被储藏起来，而德国海军则在各地建造战舰和潜艇。“凡尔赛和约”被抛入了废纸堆和垃圾箱。

1935年1月，萨尔区的居民以压倒的绝对多数将富饶的土地重新归于德国，在一片和平气氛中，希特勒在国会大谈“和平”，宣称保证德国遵守莱茵兰的非军事化，英国很快就上钩了，伦敦同意柏林放手建立一支海军，当然不能超过皇家海军的35%。

意大利对英国的背信弃义和自私的态度不是强烈反对，而是追随其后。10月底，罗马军队侵入多山的埃塞俄比亚。国联在英法操纵下采取了姑息养奸的态度——口头上的谴责与表面化的制裁，这丝毫不影响墨索里厄的计划，相反，促使他向柏林靠拢。

德意志的雄心显然使法兰西感到紧张。他们一面缩手缩脚的放纵，一面与苏联签约，这正是希特勒的借口。1936年3月7日，德国代号为“训练”的“以闪电速度的突然一击”的进攻开始了。三个营的军队兵不血刃的跨过莱茵河进入非军事区，而法国13个师的兵力一动未动，尽管洛迦诺公约规定它有权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法军开战，德国只有一件事可做：赶紧从莱茵兰撤退，而法国却终究没有动。

希特勒的照会由外交部长交给英法意的大使，法国大使苦笑说：“希特勒打了对手一耳光，而在此同时却说‘我向你提出了和平建议’”，英国人却说：“德国人终究不过是进入他们自己的后院而已。”这一次希特勒又将洛迦诺条约撕得粉碎，将希特勒的威望推向顶峰，在对进军莱茵兰的投票反应上，99%的人参加投票，而98.8%的人支持希特勒的行动。希特勒的指挥若定使将领们深信他的天才，占领莱茵兰，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军事行动，却向为征服欧洲开辟了道路。德军的气势汹汹和英法纵容的绥靖政策，使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日后这两个欧洲强国将会为未能抓住时机将纳粹战火在萌芽中掐灭——如果出兵，希特勒必将下台——而后悔不已，我们将会发现，赌徒希特勒在其后又进行了多少冒险。

当罗马的战车隆隆驶进埃塞俄比亚的首府亚的斯亚贝巴的时候，国联不得不屈服而撤消对意大利的制裁。1936年7月，佛朗哥在西班牙发动叛乱，企图一举消灭共和国。德意两国从政治、战略及外交等利益考虑，公开支持西班牙叛军，对西班牙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面对法西斯的进攻，在共产国际的号召下，世界各国的进步人士组织了“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来自苏联、中国、加拿大、法国等54个国家的4万名志愿者，编成了5个国际旅，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他们斗志高昂，纪律严明，在战斗中有1万多名战士光荣的牺牲在西班牙的国土上，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虽然最后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被颠覆，但它牵制了德、意法西斯对其他国家的侵略。

1936年10月，意大利外交部长访问柏林与德国外交部长会谈并签订了一个秘密议定书，规定了德、意两国的共同政策，包括：各自承认罗马侵占亚的斯亚贝巴；而罗马支持德奥统一，在各个国际政治重要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军事合作；墨索里尼宣称新时代已经到来，罗马和柏林的垂直线不是障壁，而是轴心，等等。

在东方，小国日本以其迅速增长的实力，挥戈东亚，而遭到英、美、法的反对，德、意、日就如同战友一样站在了一起。就在罗马和柏林结成轴心后一个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当意大利正式加入的时候，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三国成立，后来在1940年三国结成了军事同盟，以瓜分世界。

1937年5月，英国保守党的尼维尔·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这位先生很受德国人的欢迎，张伯伦将共产主义看作是洪水猛兽，而想借希特勒之力杀向苏联，因而对德国采取姑息政策。

1938年3月14日，纳粹党分子在武力支持下掌握奥地利权力后，由希特勒宣布：“我以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元首和总理的身份向历史宣告，我的家乡归并到德国。”对此，英国首相张伯伦认为这是德奥商量好的事，而当苏联要求制止德国侵略时，英国拒绝这个建议，罗马则表示友好地接受事实。于是，德国就轻而易举地吞并了奥地利。而张伯伦和欧洲的保守派们却将希特勒看作是反共要塞的司令。这样，当张伯伦要答应希特勒对捷克的领土要求时，其速度之快，就无需让人感到惊讶了。

当希特勒要取得苏台德区——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居住区而提出向捷克开火时，张伯伦竟联合法国总理达拉第向捷克政府发出照会，要把苏台德区划给德国。英法意德四国首脑一起开会要将捷克领土划给德国，只要希特勒答应进攻苏联而维护英德和平。这一聚会是1938年9月29日召开的，被称

为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

这时的希特勒已羽翼丰满，随时准备向欧洲发动进攻了。

1939年3月，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时欧洲的战略形势对德国非常有利，它控制了捷克35个师的兵力和军事设施、军火工业和在欧洲有重要地位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德国从战略地位上取得了优势，不必担心侧翼遭到进攻。此时希特勒认为时机已经成熟，1939年9月1日，德国突然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然而奇怪的是，西线英法军队以110：23个师的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却在钢筋水泥工事后躲着，而波兰军队的英勇抵抗无济于事，挥舞着军刀的骑兵在德国军队隆隆的坦克集团军和轰炸机下被埋葬了。

希特勒在两周之内以惊人的速度占领了波兰，接着便挥戈西进。1940年4月迅速攻占丹麦、挪威。5月攻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投降。英国远征军10个师的辎重全部扔下，36万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皇家海军的驱逐舰被炸掉三分之二，张伯伦垮台，由海军大臣丘吉尔接任英国首相。

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在丘吉尔领导下英勇抵抗德军。希特勒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无限期推迟，戈林开始和大不列颠空军进行较量。由于德国战略失误，加上英国雷达的有力配合，使得德国空军在这场空战中损失惨重，戈林的“鹰日作战”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这并不能动摇德军的势力膨胀。德国马不停蹄的向巴尔干扩张，侵入北非、南斯拉夫和希腊，整个欧洲几乎成了纳粹的天下。希特勒接着推行“巴巴罗沙”计划，集中所有力量准备向苏联开刀。

1941年6月21日，德国166个师全部进入阵地，第二天凌晨4点，德国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战，想一举消灭苏联。5点半，德向苏宣战。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

几十年前，当希特勒指挥着百万军队在欧洲大陆上肆虐无忌的征战时，人们会想起这个早在《我的奋斗》中详细露骨的阐述过的可怕计划吗？如果人们不去努力真心的争取和平，只能让和平这个美丽的字眼流于形式，让那些野心勃勃的刽子手们去推行他们野蛮的计划。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的崛起就雄辩的证明了这一点。愿和平永驻！

